

禁止窃听偷拍要有执行力

秦丹



今日论语

银行卡在自己口袋,钱却被人取走了。窃听定位器、针孔摄像机等设备公开叫卖,社会危害令人闻之心惊。日前由国家工商总局、公安部、质检总局制定的《禁止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和“伪基站”设备的规定》公开征求意见:禁止生产、销售、使用窃听窃照器材和“伪基站”设备。该规定拟从5月1日起施行。

法律必须对公民的个人隐私保护有所作为,也必须承担起保护公民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责任。一些不法分子为谋取利益,生产、销售针孔摄像机等设备,这些东西

流入社会,有丈夫用来监听妻子的,有考生拿来作弊的,有犯罪分子买来改装银行摄像头的,甚至还有杀人犯装在自家门口监控警察的。尤其是监听引起的命案,“伪基站”利用号码诈骗的事件,更是在以血的教训说明禁止窃听窃照行径的必要性。

依法禁止窃听窃照行为,斩断相关利益链,让公众看到了希望。但是,必须指出的是,我们之前也并非无法可依。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83条规定:非法生产、销售窃听、窃照等专用间谍器材的,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;根据《刑法》第284条规定:非法使用窃听、窃照专用器材,造成严重后果的,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

管制。有法可依,但窃听窃照和生产、销售、使用相关设备的现象泛滥,这是不是说明,一段时间以来,有关部门的执行力很不到位?

在保证执行力的情况下,一定得提高犯罪的成本。有记者暗访,发现淘宝兜售的类似设备已经更换成相对隐蔽的名称。因此,在“道高一尺,魔高一丈”的游戏中,如何维护法律的尊严,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,需要清晰的答案。

有一种声音称,禁止生产、销售、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和“伪基站”设备的规定,是保护贪官和名人。这种说法禁不起分析。的确,类似湖南衡阳6名官员没有抵得住“色诱+针孔+敲诈”,出了串案,但反腐也要依法而行。要知道,在

无序的窃听窃照状态下,人人都可能是受害者。

不要说普通人无权监听他人,即便是执法人员,也并非想监听谁就监听谁。2008年底,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了《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》,这被认为是第二轮司法改革开始的标志。通过这次司法改革,明确了监听、窃听等在内的技术侦查手段,可以适用于重大的职务犯罪案件。

监听、窃听等技术侦查手段被公权力机关滥用,后果不堪设想;这种手段若被一些个人和组织非法使用,后果同样可怕。公民的隐私权经不起伤害,公民有免于被监听的权力,信息和隐私安全理应得到保障。



新民随笔

煤老板去哪儿了

连建明

大家注意到没有,最近,关于山西煤老板一掷千金的故事几乎听不到了,前几年,到处都有煤老板的“土豪”故事。这种故事的消失是因为煤老板风光不再,煤炭企业利润大滑坡,甚至大幅亏损。2013年大部分煤炭企业利润下降一半,今年前两个月,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,煤炭开采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又下降了42.5%,煤老板的日子不好过了。

仅仅几年工夫,从最赚钱到不赚钱,如此快速变脸让人很惊讶,更让人感叹世事无常。现在回头看当初山西煤老板那些乱花钱的举动,比如“包圆”买下车展上的豪车等等,实在有些可笑,在市场最好的时候,如果用所赚的钱投资更有前景的项目,那么,到市场严冬的时候就能抵御风险了。反之,觉得钱来得太容易,毫不珍惜乱花,那么,一旦市场滑坡就毫无抵抗能力。去年底出现的首例信托违约事件主角就是煤炭企业;另一个山西煤老板曾经在三亚以7000万元给女儿办了一场极尽奢侈的婚礼,如今负债200亿元无力偿还面临崩溃。

一时赚钱不算太难,但要一世赚钱就很难很难。从全球企业的发展历程看,能够保持企业长青不倒的实际上凤毛麟角,美国道琼斯指数的成分公司从创立至今始终只有30家,但百年来唯一没有更换过的成分公司只有通用电气。

丰年的时候要想着荒年,只有未雨绸缪才能细水长流,当然,更需要不断开拓,跟上时代的步伐。眼下,电商很火,不过,纵观最近30年科技革命带来的这轮新浪潮,科技企业的更新换代速度更快,典型的是手机行业,短短的20年里从摩托罗拉到诺基亚再到苹果、三星,已经几轮企业更迭,就说目前如日中天的苹果,在其不过几十年的历史中也一度沉沦,要不是乔布斯带领苹果凭借MP3、智能手机东山再起,也许就没有眼下全球市值第一的公司,但谁又能保证苹果能一直占据智能手机老大的位置?

因此,胜不骄败不馁,是一个企业基业长青的必备条件。

“为民”是最好的纪念

权威声音

桃花红雨英雄血,碧海丹霞志士心。清明时节祭扫陵园、缅怀先烈,对党员干部来说,也是一次接受教育、洗涤心灵的契机。一位基层干部参观纪念馆,面对淮海战役中民工踊跃支前的照片,感慨地说:走群众路线,就是对先烈的最好纪念。

正是因为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,无数英烈抛头颅、洒热血,

求的是大众解放、人民幸福,一代代党的优秀干部像焦裕禄那样“心中装着全体人民、唯独没有他自己”,为的是为官一任、造福一方。先烈们的为民情怀,唤起了亿万人民在不同的年代矢志追随,也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明心见性的镜子。

当前,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已全面展开,这是对基层群众工作的一次检验和锻炼。要做到为民务实清廉,需以先烈为镜,问问和群众的感情“亲不亲”,一事当前是替自己打算还是为

民解忧;查查四风问题“重不重”,是惯做官老爷还是甘当“泥腿子干部”;看看为群众办事“实不实”,到底还有多少“最后一公里”亟须打通。从严上要求,向实处着力,才能取信于民。

古人云,为政以德,修己安民。对共产党人来说,为人民服务就是最好的政德,密切血肉联系就是最好的修养。铭记历史、学习先烈,心系群众、勇于担当,才能不断交出让人民满意的新答卷。(林彦博 刊 今日本报 本报有删节)

新民新语

去韩国考驾照?

郁晶陶

去年,被称为“史上最严交规”的公安部123号令出台,其中,新的驾考制度一度吓退了不少学车人。于是,似乎有人想另辟蹊径。

据外媒报道,一些中国人跑到韩国去考驾照,回国后再换成中国驾照。2011年,韩国放松了驾考规则,培训时间只需13小时,费用也较低。获得韩国驾照的中国人从2010年的7000人出头,上升到去年的近25万人。

看起来,韩国驾照真是“价廉物美”。不过仔细想想,虽说节省了学车费用,但交通、住宿,哪一样不要花钱?加上语言不通,即便笔试有中文版,口头交流也是个问题吧?而且在韩国报名考驾照需要“外国人登录证”,游客很难取得,要是通过中介获得,又是一笔费用。办个假证?那是违法勾当。

至于韩国驾考并不难,有人说非常容易,也有人说考试对细节要求很严,零基础者想通过十几小时培训就拿驾照根本不可能。即便相对宽松是事实,参加韩国驾考还是以在当地工作、留学的中国人居多,专门跑去考试的,应该是少数。何况,与去年全国新增的1844万汽车驾驶人相比,2.5万人连零头都不到。

不过仍有这样的担心:虽然是少数,但如果有人在韩国轻松领证,回来就成“马路杀手”怎么办?去年新司机的交通违法数量明显下降,新驾考制度起了很大作用。但新制度约束不到“另辟蹊径”的这部分人怎么办?

除了关注发展趋势,考察是否需要调整换证等方面的规则之外,也要看到,驾考严格,确能令司机更加尊重交通法规,提高驾驶水平,但并不能一劳永逸。执法严格,更能提高司机的守法意识,这也是“最严交规”取得成效的一个主要原因。试想,若无严格执法,即便驾考的通过门槛再高,司机也很可能一上路就野路豁,把学到的规则抛诸脑后。若有严格执法,且逐渐形成整体守法的大环境,即便少数人通过较宽松的方式获得驾照,也不得不谨遵法规,小心驾驶。而且,韩国的驾考再宽松,也不可能不顾本国道路安全,随随便便就把人放上路吧?



老年人的『二胎难题』

现在年轻夫妻所生的孩子,七成以上靠他们的父母带。老人不仅身心疲惫,责任重大,还常受指责。针对放开的二胎政策,不少老人表示已尽心尽力带大了第一个孩子,不想再把精力花在『二胎』身上,还想享受一下丰富多彩的老年生活。

杜建国 画

网视舆情

在最近“文章出轨”的新闻事件中,部分网民前后矛盾的表现让人惊异,他们先是对文章出轨义愤填膺,认为作为公众人物的文章欺骗了粉丝,应该受到批评,而此后,当各方近乎不依不饶的表现使得文章的处境变得极为不堪时,批评者就开始转移枪口,为文章叫屈。

舆论的上述表现可用“见风使舵”四个字来形容。过去常说中国人喜欢做道德文章,一个新闻出来,不管事实如何,谁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上,谁就会获得舆论支持,出轨的男人,作为小三的女人,因为是传统道德的负面典型,他们一旦曝光很自然就受到舆论批评。可这样的批评不会太持久,如果再仔细观察,你就会发现,舆论的态度在短时间内可

能依据道德标准,而随着事态的发展,“弱者的道德观”会取而代之,这就意味着,不管从道德角度看当事人是什么角色,只要具备了弱者的身份,他都可能收获同情。

类似的现象极为普遍,比如近年来各地出现的医患矛盾,最初患者家属去医院闹事往往会获得舆论支持,围观者认为患者一方是医疗事故的受害者,彼时,院方受到舆论批评,后来,当矛盾越来越普遍,甚至出现医生受到报复的现象后,舆论开始反转,倾向于支持院方,也正是在这样的舆论生态下,“医闹”一词被广泛认可。此外,像“路人冷漠”、搀扶老人被讹这样的新闻,也出现过上述

舆论反转的现象,开始人们往往是以一个受害者的角色被带入,而不会思考在具体的情境中当事人的困境,直到更多的细节被披露出来,才会放下道德大棒,将心比心。

这样的变化是否就意味着人们由情绪化而变得理性?恐怕很难给出确切答案,毕竟人们做评价的时候所依赖的事实有限,基本都是靠媒体输出的信息,不过在有些人看来,上述认知的转变的确表明理性的提升,秉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,当前媒体的报道再客观,都会夹带私货,有着道德评价的成分,甚至认为当前很多的社会矛盾,都是“无良媒体”报道所致。

对出轨者从批判到同情,从同情患者到支持院方,这样的变迁反映的是传统道德评价逐渐在失势,而“弱者的道德观”在崛起。个人看来,这只是观念的转变,未必是理性的提升。在这个转变过程中,媒体在这其中的角色是委屈且尴尬的,它不能轻易丢掉道德评价这一固有传统,另外在认定弱者的过程中肯定又不如个体反应那么敏捷,很多时候,它所能做的是兼顾传统的道德评价和“弱者的道德观”,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,很多媒体表现得没有价值观,或者只有相对低级的价值观,但是很少有专业、中立、客观的表现。

“无良媒体”的委屈与尴尬

何小手